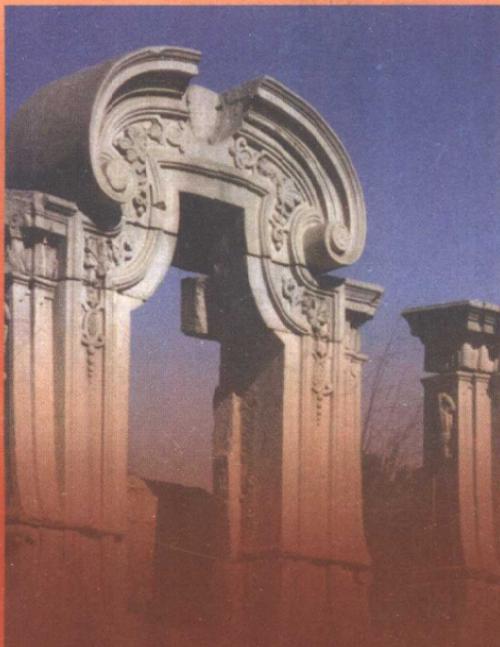


中学课本背景知识

中国历史

分册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学课本背景知识·中国历史/朱可等编写.一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10

ISBN 7-5339-1531-3

I. 中... II. 朱... III. 中国史课-中学-教学参考
资料 IV.G6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7356 号

丛书策划 王忠义 李明华

责任编辑 余文军

装帧设计 徐忠波

“中学课本背景知识”系列

中国历史分册

朱可 何凡 戚青平 编写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飞达工艺美术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25 字数 130000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531-3/I·1365 定价:7.50 元

前　　言

《中学课本背景知识》面世了。

翻开中学各学科的课本,我们往往会陶醉于呈现在面前的宝贵知识,惊叹于一条条数学公理,一个个物理发现,一项项化学成果,一种种生物学说,一件件历史事件,一篇篇文学作品……惊叹于这一切人类文明的结晶。然而,人类文明的背后,总是站立着一个个创造文明的巨人:高斯,牛顿,诺贝尔,巴甫洛夫,爱迪生,华罗庚,杨振宁,林肯,鲁迅……他们独树一帜的科学思想,光芒四射的创造品质,追求真理的奉献精神,无不激励我们奋进。开发、扩大中学课本的教育功能,让我们在汲取丰富知识的同时领受这些科学巨人留传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以提高自身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这就是我们编写这套书的意图和目的。

这套书,在选材上具有“紧扣课本,力求精要”的特点。大都通过促进科学发展的重大发现、发明、创造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大事件,来展示其精神内涵和巨人风采,让人在获取知识的同时产生精神上的升华。在行文上,力求做到通俗易懂、活泼生动。从而使这套书充满情趣性和可读性。

因此,这套书既可作为教学的辅助材料,用之于教学过程中,丰富教学内容;又可作为课本的扩展读物,用之于课外阅读。

首次编写这种拓展课本教育功能的读物,缺点疏漏在所难免,恳切地希望广大读者发现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以利修订完善,使之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编　者

2001年8月20日

目 录

-
- 1 ● 考古学上的奇迹:裴文中与北京人
 - 5 ● 高尚道德的化身:尧、舜、禹的传说及其“禅让制”
 - 9 ● “殷墟”:三千年前的帝都
 - 14 ● 姜太公钓鱼,文王上钩:姜尚辅助文王、武王灭商
 - 19 ● 不是冤家不碰头:管仲辅齐桓公首霸
 - 24 ● 周游列国 “仁”心不改:孔子和儒家思想
 - 29 ●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不屈的屈原
 - 34 ● 纸上谈兵结恶果:秦赵长平之战
 - 39 ● “千古一帝”:秦始皇嬴政
 - 44 ●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
 - 49 ●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楚汉之争中的悲剧人物项羽
 - 54 ● “凿空西域第一人”:丝绸之路的开辟者张骞
 - 59 ●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与《史记》
 - 64 ● 隆中对策惊天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
 - 70 ● “乱世之奸雄乎”:为曹操辩诬
 - 75 ● “投鞭断流”的骄狂与“风声鹤唳”的凄凉:
 苻坚与淝水之战
 - 79 ●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隋炀帝与大运河
 - 83 ●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魏徵与唐太宗

88	“无字碑头镌字满”:中国惟一的女皇帝武则天
93	“壮志未酬身先死”:周世宗改革
97	“薄命君王,绝代词人”:南唐后主李煜
102	“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尽忠报国的抗金英雄岳飞
107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抗元
112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117	知识分子的灾难:明清的文字狱
122	“杀父报国”:郑成功收复台湾
126	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康乾盛世
130	“忽喇喇似大厦将倾”:封建社会的缩影《红楼梦》
135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近代中国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
140	敲响大清帝国的丧钟:中英《南京条约》
145	“文明者”的野蛮行径: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150	“天下一家,共享太平”:洪秀全的崇高理想
155	没有皇冠的女皇慈禧太后
160	洋务运动的发起者曾国藩
164	维新主将、师徒双璧:康有为和梁启超
169	狂飙:义和团运动
174	天下为公:孙中山
180	大浪淘沙:“一大”代表寻踪

考古学上的奇迹

裴文中与北京人

电影《世界奇案的最后线索》演绎了这么一个故事：一艘满载从中国战场掠夺来的奇珍异宝的日军舰船，在太平洋海面上被盟军的炮火击沉，许多珍贵的、不可复得的宝物就在这一瞬间沉没于万顷碧涛中，其中就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不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如何，我们从中可以得到这样一个信息：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是考古学上的奇迹，由于它的珍贵与独特地位，曾引起日本侵略者的觊觎。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下落不明，至今仍有不少国际机构悬赏征集线索，以期能让这一化石重现于世。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之所以在考古学界能有这样的影响，是因为它能全面地反映出旧石器时代我们祖先的生活情况。虽然元谋人、巫山人的生活年代都比北京人要早，但它们的化石缺少头骨与骨架，证据并不充分。而1929年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就给考古学界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它证明，最起码在五十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祖国的大地上生存。

北京西南周口店有一座石灰岩的小山，采石工经常在洞穴和裂隙的砂土中发现古人类化石，当地老百姓因

此称之为“龙骨山”。1918年,来华担任矿政顾问的瑞典人安特生偶然来到了龙骨山,并进行了一些随意的挖掘。1926年,外国科学家们证实,安特生等人1923年挖掘出的化石中有一颗是原始人牙齿的化石。不经意间,沉睡五十万年之久的北京人的化石终于被发现了,它如同一颗重磅炸弹震撼了整个世界科学界。但遗憾的是化石太少,证据不充分。于是在1927年,中国地质调查研究所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分别代表中外双方签署了系统挖掘周口店文化遗存的协议,经费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教授主持挖掘。

裴文中教授(1904—1982),是我国现代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古人类学的奠基人。1927年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后留学法国,攻读石器考古学。1937年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主持领导全国众多的考古发掘,并从事研究、教学工作。1929年12月2日下午4时许,太阳落山,寒意袭来。裴文中教授正在主持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挖掘。由于他的敬业精神感染了参与这项工作的许多工作人员,因此,虽然时间已晚,但人们仍一丝不苟地努力工作着。在昏暗的烛光下,忽然有人大声叫了起来:“这是什么?人头!”裴文中教授激动万分,他连忙跑过去,亲手将这个人头化石慢慢地从泥土中取出,这就是震惊世界的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他为人类发展史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

“北京人”在人类发展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首

先,经考古发现,“北京人”已经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能否制造工具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发现了“北京人”制造的石器和石制品十万件以上,那里被称为“北京人之家”。如此众多的古人类文化遗存是举世罕见的,它表明我国进入“旧石器文化”时代同样是非常早的。

其次,“北京人”能够使用天然火。使用火与制造石器是早期人类最主要的两项文化成就。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教授曾作过精辟的论述:“人类对火的控制,是人类制作第一把石刀之后,在人类历史上发生的第一件大事。这一伟大创造,在人类发展史和人类文化史上,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迄今为止,世界上尚没有更早于“北京人”确凿用火痕迹的证明。而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考古发现,提供了北京人广泛使用火的无可争辩的证据,证明了北京人已经进行着较高水平的活动。著名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史稿》中有过这么一段描述:“在北京人居住过的山洞里发现了火烧过的灰烬、石块和兽骨。这些灰烬有时成层,有时成堆。灰烬里有一块块颜色不一的火烧兽骨和石头,一粒粒烧过的朴树籽及烧过的紫荆树木炭块。这些迹象表明他们已经掌握和使用天然火了。”火的使用既能防止疾病和扩大食物来源,又能增强人们的自卫和自存能力,使人类不断地向文明时代发展。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用火是人类文明的起点。

再次,“北京人”生活的时代,自然环境险恶。为了求

得生存,人们共同劳动,共同享用得来的食物,过着群居的生活,构成最早的人类社会——原始人群。

冥冥洪荒,茫茫大地,在远古时代,人类的祖先是如何生活的?我国的文明历史又是如何开始的?这些问题困扰着许多人。“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给这些疑问提供了明确的答案。外国古人类学家曾说:“北京人挽救了爪哇人。”意思是由于北京人遗址发现了大量石制工具和用火痕迹,因而确定为早期人类,使没有发现用火痕迹和石器的爪哇人也同时被证明为古人类遗骸。虽然,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由于种种原因而下落不明,但我们至今已经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中挖掘出六个头盖骨和无数的骨骼化石,分属四十个以上的男女老幼不同的个体,为世界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作为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的主持发掘者,裴文中教授对中国乃至世界的考古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除了主持挖掘北京人遗址外,裴文中教授还主持挖掘过山顶洞人遗址;在广西发掘巨猿下颌骨和牙齿化石,解释其地层年代问题,探讨了巨猿在进化系统上的地位;发掘并深入分析丁村遗址、四川资阳人化石、内蒙古萨拉乌苏遗址;总结研究了中国旧石器文化基础对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影响,促进了我国石器考古学的发展。

高尚道德的化身

尧、舜、禹的传说及其“禅让制”

在我国人民的心目中，尧、舜、禹一直就是中华民族高尚道德的化身，一直就是“圣贤”的代名词。那么，尧、舜、禹为什么能够在人民的心目中留下这么美好的印象且历经数千年而不衰呢？我们有必要了解尧、舜、禹的生活时代以及他们对社会发展所作的努力与贡献。

尧、舜、禹是黄帝以后黄河流域的几位前后相承的贤能的部落联盟首领。尧又称陶唐氏，故称唐尧；舜是有虞氏的成员，故称虞舜；禹是夏后氏人，称为夏禹。陶唐、有虞、夏后就是他们的部落联盟的名称。尧、舜、禹之所以能够在历史的舞台上树立一个文明、圣贤的典范，与他们所拥有的良好的美德是分不开的。

尧的美德在于无私、爱民，俭朴、真诚。古书记载说，当他的部落里有人遭受饥饿时，他认为“这是我使他遭受饥饿的”；当部落里有人遭受寒冷时，他认为“这是我使他遭受寒冷的”；当部落里有人犯罪该受罚时，他认为“这是我教育不到的缘故”。于是他检讨自己的过失，更深入地关注民众的疾苦。这样，尧以自己的无私爱民受到了大家的敬重，被后人称为“仁君”。相传，尧时社会管理井井

有条，农业、手工业、法律、音乐、教育都有专人管理，如后稷“播时百谷”，“民皆法则之，天下得其利”。尧对人民施以爱心，对自己的要求却十分严格，他住茅草屋，喝野菜汤，穿粗麻衣，用土钵子，后人曾感叹地说：“恐怕连一个小小的门吏，生活也比尧要好过得多。”在他的管理下，“帝尧之世，天下大和，百姓无事”，人们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自由自在的生活。

舜的主要美德是宽厚待人和以身作则。他曾受到继母和同父异母兄弟的陷害，多次遭遇生命危险，但每次都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妻子的帮助而逢凶化吉，对继母及异母兄弟却始终不记前仇。在担任部落联盟首领之后，更是处处以德报怨，使他的仇人都受感化而向善了。舜还严以律己，以身作则，团结周围群众。《史记》记载了这么一段感人的故事：舜在历山耕田，不久，当地的农人都争着让起田界来；舜到雷泽地区打鱼，不久，那里的渔民也争着互让渔场；舜又到河滨地区去制陶，不久河滨地区的陶器就制作得既美观又耐用。舜居住的地方，一年成村，二年成镇，三年就变成大都会了。如此强大的感召力，怎么能不为众望所归呢？

禹的美德在于他身先士卒、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奋斗精神及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这些美德在他的治水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展现。禹的主要贡献是“平水土定九州”。为了集中精力治水，他直到三十余岁才结婚，婚后才四天，就风尘仆仆奔向治水工地。为治水，他四处奔

波，三过家门而不入，亲身劳作，以至“胼胫无毛”，一身病痛。经过十三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治住了水患。19世纪的法国学者塞缪尔这样惊叹说：“大禹治理了两条大河。它们的流速等于、而宽度几乎等于美洲的那些大河，并把成百条河流的大水引入十万平方里格以上的土地上。”他的杰出成就为我国赢得了“一个一向注重培植和尊重知识的民族”的评价，他的忘我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组成部分。至今人们仍以各种方式来怀念禹。河南开封有禹王台，相传他治水时曾住在这里；浙江绍兴有大禹陵和禹庙，传说他晚年大会诸侯，老死此处。此外，山西的河津县有禹门口，夏县有禹王城等，这些地名都表达了人民对这位具有高尚道德的治水英雄的尊敬与怀念。

尧、舜、禹最为人民所称道的事迹还是“禅让”。禅让的意思是指自动把部落联盟首领的位置让给别人。这实际上就是原始社会的一种民主推选部落联盟首领的制度。我国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对此有过详实的描述：“据说，尧在帝位，咨询四岳，四岳推选虞舜做继位人。舜受各种试验后，摄位行政。尧死，舜正式即位，舜也照样咨询众人，选出禹来摄行政事。舜死，禹继位。禹在位时，众举皋陶作继位人。皋陶死，又举皋陶子伯益为继位人。禹死，子启夺伯益位自立。‘禅让’制度从此废弃。”“禅让制”在我国古代确实存在并且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它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到尧、舜、禹时期，文明确已有了相当的进步。随着禅让制被夏启破坏，中国的原始社会

就走到了尽头，开始迈入奴隶社会时期。《礼记·礼运》所描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理想社会开始被“天下为家”的剥削社会所取代。

此后，中国的封建王朝也多次上演过禅让的闹剧。然而，此时的禅让制已经成为权臣、大将逼宫篡位的借口，已失去了民主的痕迹，只留下了以武力为后盾的权臣们的骄横和末代皇帝孤苦无依的凄凉与无奈。惟一值得一提的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改朝换代减少一些血腥与暴力，使他们登上皇帝宝座之时可以心安理得一些。

对于禅让制，我国另外一位著名史学家尚钺先生对此曾作过理性的思考：“在氏族社会中，氏族成员对于部落酋长既有推举权，又有罢免权。所以氏族社会是民主制的社会。自然，氏族社会的民主制我们不能过分理想化，因为这种制度是建立在生产力不发展，氏族成员集体协作、共同劳动的基础上的，建立于血缘关系的狭隘性之上的，与现代的民主制度有很大的不同。”

尧、舜、禹的传说，自然免不了有夸张美化的成分，它融入了后人对理想社会、理想人性、理想帝王的美好期盼，融入了中华民族共同认可的道德规范。这些传说所蕴含的道德规范、道德理想，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们将永远影响中华民族性格，使中华文化之脉绵延不绝。

“殷墟”

三千年前的帝都

北京、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是我国享誉世界的六大古都,然而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历史名都的名单上增加了河南安阳。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安阳就是我国三千年前的帝都——“殷墟”。那么,这么有名的历史名城,是如何被揭开笼罩其上的重重历史迷雾,展现在世人目前的呢?这里面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1899年,时任国子监祭酒的清末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因病延请太医诊脉处方,遣家人从北京达仁堂中药铺购得一些治疗疟疾的中药,在其中的一味中药“龙骨”上,意外地发现了一些陌生的古代文字,身为金石学家的王懿荣大喜,便以每字二两银子的高价,把有字的龙骨都买下,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就这样被发现了。王懿荣先后收集甲骨一千余片,被认为是“甲骨研究第一人”。然而,可惜的是当时国内烽火四起,不久,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王懿荣投花园水池而死,未能对甲骨文进行深入研究。

后来收集和研究甲骨的人越来越多,其中最为著名

的是清末史学大家罗振玉。他先后搜集甲骨三万余片，编成《殷虚书契》前后编等书。1908年罗振玉和王国维对殷墟地点进行了考定，他们确定了甲骨文出土地点为河南安阳西北五里之小屯，也就是《史记·项羽本纪》所说的“殷墟”，是沉寂了三千多年的商代帝都遗址。他们对殷墟的考定，为后人研究甲骨文和殷商史提供了可靠的、基本的方向。

从1928年至1937年十年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对殷墟先后进行了十五次发掘，共获有字甲骨二万四千余片，编为《殷墟文字甲编》和《乙编》，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抗战爆发后，发掘工作被迫中止。新中国成立后，从1950年就开始重新对殷墟进行挖掘。通过考古学家不懈的努力，占地三十多平方公里的殷墟，已经清楚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殷墟的发现是考古学上的奇迹，人们普遍认为“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它标志着中国现代史学的诞生。通过对殷墟的发掘，历史学家们有了一系列重大发现。

首先是甲骨文。我国迄今为止已经在殷墟发现了甲骨十五万片左右。1979年，郭沫若和胡厚宣等人从中选用了四万余片编成了《甲骨文合集》一书，是研究甲骨文的主要参考书。

甲骨文是研究商代历史的主要依据。我国著名甲骨学家胡厚宣说过：“所谓甲骨文，乃商朝后半期殷代帝王

利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卦时，刻写的卜辞和记事文字。”殷代人迷信鬼神，商王室的一切行政和日常事务，都要探询鬼神的旨意，不论祭祀、战争、打猎、刮风、下雨、疾病、生育都要向天问卦。占卜的方法是：选取好的淡水龟甲和牛胛骨，干洁后在甲骨的反面挖成若干行非常整齐的椭圆形孔槽，仅留薄薄一层不穿透甲或骨面，名曰“钻”。卜时将钻好的甲骨取来，选取一孔在正面差不多的地方画一道墨，名为“墨”。又在所选定的孔中放入艾绒，点火灼之，使甲骨薄面出现纵横交错的裂痕，名曰“灼”。灼后观察裂纹是否侵及墨道和所灼裂纹呈什么形状。凡侵及墨道者称之为“食墨”，吉；不侵者为“不食”，不吉。其裂纹的形状，大致分为五种：雨、霁、蒙、驿、克，是为“兆”。这一系列的活动统名曰“卜”。将卜的预兆和后来的证验等一系列活动刻于所卜的兆旁，名曰“贞”。因为商人无事不卜，卜必有贞，就积累下无数的卜辞，这就形成了甲骨文。甲骨文的记载十分广泛，从经济、政治到祭祀、战争，从生产、生活到社会意识、天文历法，各方面无所不包。因此，凡是商代重大的活动，在甲骨文里都有体现，有的内容甚至可以和《史记》相印证，是研究商代历史以及我国奴隶社会历史不可或缺的第一手材料。

从文字发展的历史来说，甲骨文的历史地位也是不可抹杀的。甲骨文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是“我国目前能看到的最早而又比较完备的文字”。它已经自成系统，已包括三千个以上的词汇，涉及名词、代名词、动词、助动

词、形容词等数大类。一片甲骨上的文字就已经具备了文章的三要素,是我国最早的文章形式,而且还能组成一百七十字的记叙文。甲骨文已经具备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汉字“六书”构字规律。它的大量出现说明至晚在商朝,我国中原地区已经出现了相当高的文明。

在甲骨学史上,有四位学者作出过重大贡献,被钱玄同誉为“甲骨四堂”。这就是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号彦堂)、郭沫若(号鼎堂)。这四位甲骨学家各有建树,在古文字学、古文献学、考古学和社会历史科学上开拓了甲骨学研究的新领域。罗振玉在甲骨文的收集、收藏上居功甚伟,促成了甲骨学史上第一部著作《铁云藏龟》的出版,开了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历史的先河。王国维在甲骨文字的考释上多有发明。他的最大成就就是在甲骨学研究上首立考史一目。董作宾是我国甲骨学和考古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把西方考古科学运用于殷墟发掘,结束了甲骨文的“盗掘时期”,开始了有组织的“科学发掘时期”。郭沫若在甲骨文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把古文字和古史研究结合起来,开创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

殷墟的重大发现,除了甲骨文以外,还有大量珍贵墓葬、祭祀坑、车马坑等。小屯东北地区的殷墟中心还保存了宫殿、宗庙的遗址。这些遗址和文物一方面反映了三千多年前的社会生活状况,同时也揭示了当时的文明程